

佛山南海陶瓷罐,在广州被搬上南海I号 李岩:这种精准确认,在水下考古史上实属首例

南海I号宋代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,日前,被确认产自广东佛山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。近日,新快报《收藏周刊》记者专访了著名考古学家、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研究馆员李岩先生,他详细介绍了本次发现的缘起和推进过程。他强调,在全中国水下沉船考古历史上,这是首次做到如此精准的从产地、集散地到船舱“三点一线”轨迹确认。他同时对南海I号接下来的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充满期待,并建议在聚落考古的概念框架下进行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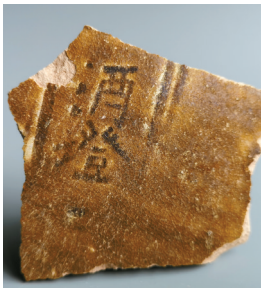
■南海I号印花陶罐2018NHIC10C②:0090



■南海I号印花
2018NHIC10C
②:0090



■佛山博物馆藏奇石村出土陶罐纹饰拓片



■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“酒澄”款标本



■南海I号出土
“酒澄”款标本
2018NHIC10c
②:0088

链接

从生产瓷器到生产陶瓷“快递箱”
“海丝”上的广州在不断灵活转型

收藏周刊:从前学界有人认为广东瓷业到了南宋之后开始衰微。

李岩:普遍有这种说法。

收藏周刊:本次重大发现的公布,是否为广州在丝绸之路上的陶瓷产业研究,拓宽了视野?

李岩:具体来说,是扩充了我们对于广东生产的储物类、包装类瓷器的重要性的认识。如上所述,这类罐子,是食物等的“包装”,类似今天快递所用纸箱。此前我们较少去思量包装类瓷器在制瓷业中的分量,而考古实证,这类物品甚至远在肯尼亚都有发现,可见其“销路”之广。这说明南宋时我们的制瓷业并未式微,而是以另一种业态继续发展。

收藏周刊:产业转型。

李岩:对,为了适应海丝的发展,我们产业转型了,开始生产“快递箱”。

收藏周刊:为何当时要生产这么多“快递箱”?

李岩:这显然与广州从先秦就开始的“都会”地位相匹配。到了汉代,司马迁在《史记·货殖列传》中提到,“番禺亦其一都会也,珠玑,犀,玳瑁,果布之凑。”都会,就是海内外各门类货物都在此聚会。

此时这个都会仍处于朝贡贸易阶段,目前文物实证包括来自域外的以“蜻蜓眼”为代表的珠饰和以金戒指为代表的黄金制品,这些是朋友来“认门”所携带的精致手信。到南朝至唐代中期,除了金银器和金银币,随着佛教传入,光孝寺等地出土的宗教类文物,确凿地表达着当时人们的虔诚;而广州,不仅是达摩西来初地,后来更成为南方禅宗的中心。在这些阶段,我们贸易和文化图层的底色是:多元开放下的吸纳。

晚唐以后,从出土文物来看,我们开始转“输入”为“输出”。黑石号沉船出水大量长沙窑,南越国宫署遗址在晚唐五代地层也出土很多此类瓷器,可见广州港的活跃。“广东人”也开始意识到出口陶瓷能赚钱,这时,精彩开始了,广东特别是三角洲地区的瓷窑嘍嘍嘍如春笋勃发。

所以,对于广东而言,海上丝绸之路早开,贸易和文化交流历经了从奢侈品、到宗教和文化艺术、乃至日常生活用品的迭变,也因这里的兼收并蓄和博采众长,所以总能审时度势做出最佳反应。您看北宋时期,广东窑址简直多极了。到了南宋,人家搞“快递包装”业,又兴起了一波。不见得要具体生产各门类商品,但商品“都会”于此,我们就可以给你生产、提供包装材料。因为广州是离岸最重要的港口之一,所以还会有大量食品补给。

因此我要说,广州在海上丝绸之路上的重要地位,在不同历史时期,都有着不同的、具体的、精彩的表现方式。

■本版图片由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、南越王博物院、佛山博物馆提供

大湾区学者共同努力的成果

收藏周刊:南海I号沉船上的部分陶瓷器,日前被确认产自广东佛山南海区奇石窑和文头岭窑。您是这个重要发现的核心人物。两年前,是什么线索引起了您关注?

李岩:当时,我与南越王博物院李灶新先生谈及南海I号沉船年代问题时,同时注意到一件丙子年款大罐。他告诉我,考古报告中认为这件大罐是福建磁灶窑所产,应是搞错了,这类罐子应是广东佛山南海奇石窑及文头岭窑产品,并向我提供了最早提出这一观点的相关文章,作者是香港中文大学黄慧怡老师。我当时就说,这事太重要了!

为何?我们对南海I号国内航线一直特别关注,如果船上有佛山制造大罐,那它应该曾在附近停泊,否则罐子怎样搬上去的?南海I号和珠三角的关联度,就这样产生了。

随后我邀请南海博物馆吴振宇馆长安排馆内年轻人,在“考古大家谈”公众号上专文介绍南海区博所藏奇石窑标本,以期引起学界注意。接着,我们几人连同广东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肖达顺先生等,奔赴奇石窑和文头岭窑,通过窑址踏查及比对现场和馆藏标本,依考古类型学角度,一致认可了黄慧怡的看法。从这个意义上来说,这是大湾区学者们共同努力的成果。

随即肖达顺和李灶新向崔勇副院长汇报了发现情况,崔勇先生凭借他的责任感和学术敏感度,要求达顺尽快提供工作计划,并很快推动项目经费落实。

其间又联系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崔剑锋先生,向他提供了窑址标本,及南海I号和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遗迹地层中出土标本,以进行便携式XRF产地分析。

收藏周刊:为何会选取南越国宫署遗址标本?

李岩:这跟一组字有关,最主要就是“酒澄”二字,据李灶新的研究,南宋时公使酒库就位于宫署遗址。他们发现大批肩部刻印字款或纹饰的酱釉大罐,与南海I号和奇石窑同类陶罐高度一致。这意味着广州可能是这种产品的集散地。

通过检测标本微量元素,并结合2021年底对奇石窑和文头岭窑的抢救性考古发掘等,我们最终确认:从南海区窑址,到广州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地层,再到南海I号沉船,是此类罐子在珠三角的生产、移动轨迹。

此类罐子大部分应用来装酒,铭文已告诉我们。窑址生产了酒的容器,容

器在南越王宫署遗址(现北京路致美斋隔壁)宋代酒库,被灌进广东米酒,然后被运上南海I号。宫署遗址宋代公使酒库,正是这种酒和罐子的相遇和集散之地。

以聚落考古视角复原社会生活

收藏周刊:您如何评价这次考古发现的重大意义?

李岩:本次《中国文物报》以两个整版来报道这次发现,在广东考古发现的学术史上还是头一次,如此,方与关系到南海I号相关研究的重大发现相匹配,这与曹院长的积极推动密不可分。

目前,在全中国的水下沉船考古历史上,这是第一次能做到如此精准的“三点一线”轨迹确认,从产地、集散地到船(甚至具体到了舱位),都被我们确认得清清楚楚。前所未有的,意义重大。

收藏周刊:要做到这种“成绩”,应遵循什么方法?

李岩:必须按照“聚落考古”的方法进行发掘和研究。水下考古从方法论上说,就是田野考古向水下的延伸,同样需要考古地层学、考古类型学和聚落考古思想,并加以科技考古手段。这方法应是未来同类研究的一种很好的参考模式。

从底层逻辑来说,舱位等同于多室结构墓葬。依此逻辑出发,它的航线和停泊,它的不同舱位的不同货物乃至货物的装载存放信息,都是聚落考古非常关注的问题。

而对船体的发掘和研究,我们要关注装船的过程、正常航行的过程、沉没的过程、沉没以后的过程。这四个过程,是我对包括南海I号在内的沉船聚落考古的顶层思路。

发掘时,与这几个大的过程有关的任何信息都非常重要。如果没有带着这种思路进入,就可能把船挖成“一锅粥”。

收藏周刊:在这种思路引领下,船上聚落的社会生活,将得以再现?

李岩:将尝试复原当时的“社会生活”。虽然这种复原永不可能达至原始状态,但可无限接近,您看这次就非常接近产地、集散地和装船的事实细节。

正由于产地、集散地的原因,我们可以肯定地说,南海I号离岸港口是广州港。包括从此前学界的分析可见,最北停靠过的港口应是杭州,一路南下到广州,远航离岸前,装上最后的补给,不仅有这些酒或淡水,我推断船上的鹅、羊以及咸鸭蛋大体应当都是在广州补给。

更大范围来说,由于这些罐子被装

载上远洋船舶,所以东到日本、朝鲜,西到印尼乃至肯尼亚,都见到它们的遗存。显然,在宋代海上丝绸之路,广东制造、佛山制造和南海制造都相当了得。

本次模式可在其他沉船考古中推广

收藏周刊:您说的这种模式,将对南海I号乃至水下考古研究带来什么积极推动?

李岩:第一步,首先要确认船上有多少来自南海的此类罐子,以及它所盛载的物品;目前发现的装鸭蛋甚至杨梅的罐子,是否也产自这里?南海I号发掘出十多万件套瓷器,产自江西、浙江、福建、广东等不同窑口,就其中的两大类(储物类和实际使用的)瓷器而言,我们都可尝试把它们的产地与集散地逐一对应,当然,这个过程也许漫长。但这样的研究,几乎能深入到海上网络贸易系统的毛细血管层级。

对销售地的研究展望,也让人心潮澎湃。据北京大学秦大树老师论述,远到肯尼亚;早到唐代,晚到明代,都可见广东产的这种储物罐。如果都能把它们和广东具体窑址去做对应——我们试想一下对内和对外这两个系统呈现出的丰富性!

所以我说,这种突破的模式,给我们打开了一排排的窗户,从此视角更为广阔!

在田野考古,特别是聚落考古的概念下,统领沉船发掘,综合考虑产地与集散地;并且充分利用科技手段,对沉船的瓷器产地进行基因级别对应研究,这种模式如果在南海I号或其他沉船考古当中推广开来,我们可以想象:有多少历史细节会展现眼前!

我们广东考古不仅有田野还有水下,而且现实要求我们广东考古人必须将两者结合才能有所突破,才能对得起海上丝绸之路的历史以及公众的期待。

所以我们也非常期待《南海I号沉船考古报告之三》的面世。希望尽快开展资料整理和报告编写,并且按照聚落考古的原则和方式,以田野考古所见多室墓的角度来编写发掘报告,尽可能客观全面报道发掘的出土(水)的各种遗物和现象,才能互相配合,把研究推向深入。

同时,从目前南海I号出土(水)文物的收藏情况来看,建立包含所有遗存信息(不同年度)的全数据电子化数据库十分必要,至少在虚拟空间,可以拥有一套完整的南海I号考古调查、发掘资料,为将来的研究与展览打好基础。